

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张爱冰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

内容提要:安徽铜陵谢垅窖藏出土青铜器因其出土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是皖南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资料。根据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其形制特征则可说明江淮群舒族群和文化的向南迁播。

关键词:铜陵谢垅 青铜器 春秋早期 群舒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1989年铜陵市北郊谢垅窖藏出土一组青铜器共5件,分别为球腹蹄足鼎1、附耳平盖鼎1、分体甗1、曲柄盃1和三足匜1^[1]。原发掘简报拟定本组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肖梦龙等在皖南青铜器分期中将其作为春秋中晚期的典型器群^[2];杜迺生亦认为谢垅出土曲柄盃为春秋晚期器^[3]。本组青铜器因其出土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是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中的重要资料。本文拟结合近年新出之资料,重新考察谢垅青铜器的形制、变化和年代,并根据其文化因素的构成讨论西周春秋时期皖南、宁镇和江淮地区青铜文化的空间格局。

一 球腹蹄足鼎

球腹蹄足鼎为宗周器形,基本形态是器腹圆底呈半圆球状,蹄形三足,双耳多立于口沿上,少数为附耳。纹饰多在口沿下饰一周夔龙纹、窃曲纹、重环纹或弦纹。球腹蹄足鼎在西周中晚期出现,西周晚期最为常见^[4]。

谢垅出土球腹蹄足鼎(铜陵市a22),口下饰一周重环纹,纹作三重,上下有弦纹作界栏。立耳外侧饰两道凹弦纹。通高20.4、口径22厘米(图一;图二;彩插一:3)。

重环纹由横置的长圆或圆形图案连续或大小相间排列,多施于口下等位置。重环纹可能由龙蛇类的鳞片演化而来,故亦称横鳞纹。重环纹盛行于西周中晚期。

重环纹球腹蹄足鼎,皖南还出土数件。繁昌县汤家山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大小相间重环纹,上下有弦纹作界栏^[5]。当涂县姑孰镇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大小相间重环纹,上下有弦纹作界栏,其下又有一周弦纹^[6]。宣城市正兴村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重环纹,纹作三重,上下有弦纹作界栏。立耳外侧饰两道凹弦纹^[7]。铜陵市金口岭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重环纹,上下有弦纹作界栏^[8]。汤家山组伴出兽面纹连体甗、乳钉纹方鼎、龙钮圈足盖盃和鱼龙纹盘等,正兴组伴出绳耳鬲和龙纹钟,年代都不晚于西周晚期。

重环纹球腹蹄足鼎宁镇区少见,江北区多有出土。枞阳县横埠镇墓葬出土2件,立耳略外撇,耳外侧饰两周小圆点纹,间以弦纹。一件口下饰一周细线条四重重环纹,其下又有一周弦纹。另一件口下饰一周拉伸式细线条四重重环纹,其下又有一周弦纹。该组伴出1件西周早期形制的分解式兽面纹筒形尊^[9]。

因此,谢垅重环纹球腹蹄足鼎的年代拟定为西周晚期。

二 附耳平盖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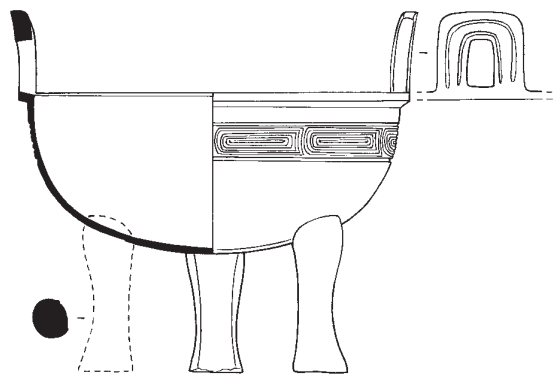
附耳平盖鼎的基本形态是,长方形附耳,子母口,平盖有直裙,深腹微垂,三蹄足。盖中一般置环形钮,盖周置三个矩形捉手。

谢垅出土附耳平盖鼎(铜陵市a8),盖面饰一周夔纹,盖的折边直裙饰一周勾连云纹。口下饰一

收稿日期 2009-01-20

作者简介 张爱冰(1961~),男,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安徽区域考古、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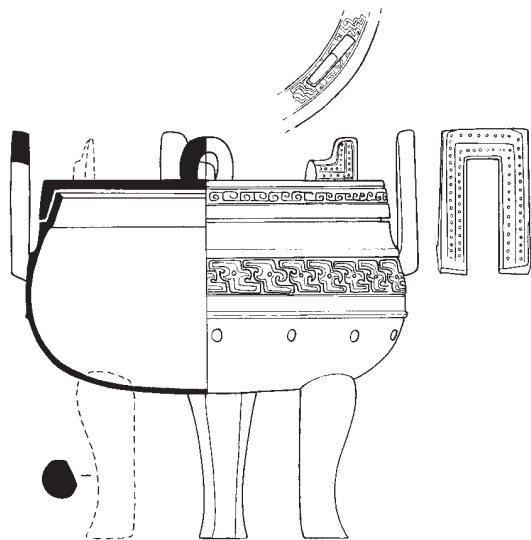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 本项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05BKG003)、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SK041)和安徽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



图一// 重环纹球腹蹄足鼎



图二// 重环纹球腹蹄足鼎腹部纹饰拓片



图三// 附耳平盖鼎

周夔纹,其下有一周凸弦纹,再下又有一周乳丁纹。矩形捉手及附耳外侧均饰两周小圆点纹,间以弦纹。通高22、口径17、腹深10.6厘米(图三~五;彩插一:5)。

郎溪县十字镇还出土1件鼎,失盖。口下饰一周夔纹^[10]。十字组伴出撒耳浅垂腹短扉鼎和镂孔甗形器,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

附耳平盖鼎宁镇区没有发现,江北区极为常见,依纹饰又可区分为2式:

式口下饰夔龙纹,4件。舒城县河口出土2件,盖中置扁条形环钮,捉手上饰雷纹,盖面饰一周窃曲纹,口下饰一周夔龙纹。耳外侧饰两道小圆点纹,间以弦纹^[11]。肥西县磨墩子出土1件,形制、纹饰与河口组同,唯盖的折边直裙饰有一周拉伸式重环纹^[12]。庐江县春秋塘出土1件,失盖,形制、纹饰亦与河口组同^[13]。

式口下饰夔纹,5件。舒城县凤凰嘴出土2件,盖中置半环钮,捉手上饰雷纹,盖面饰一周窃曲纹,口下饰一周夔纹。耳外侧饰两道小圆点纹,间以弦纹。有铜棍横贯盖钮与鼎耳^[14]。望江县出土2件^[15],舒城县出土1件^[16],形制基本相同,纹饰略有区别。

河口组、春秋塘组、凤凰嘴组与谢垅组均伴出曲柄盃,河口组与凤凰嘴组又都伴出牺首鼎,磨墩

子鼎所饰拉伸式重环纹又见于谢垅组球腹蹄足鼎,附耳平盖鼎的族群渊源和年代关联显而易见。

式夔龙纹伴饰重环纹,似略早于式夔纹。谢垅和十字所出属于式,渊源或在江北。

殷涂非以凤凰嘴所出附耳平盖鼎考证所谓铉鼎之制,鼎盖上可以抽插、横穿盖钮以贯鼎耳的铜棍为铉,铉是关鼎的闩子。而附着鼎盖边缘的覆巾布迹则为鼎,鼎是覆于鼎盖上的疏布巾^[17]。

附耳平盖鼎的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要素对春秋中晚期及其以后鼎形器影响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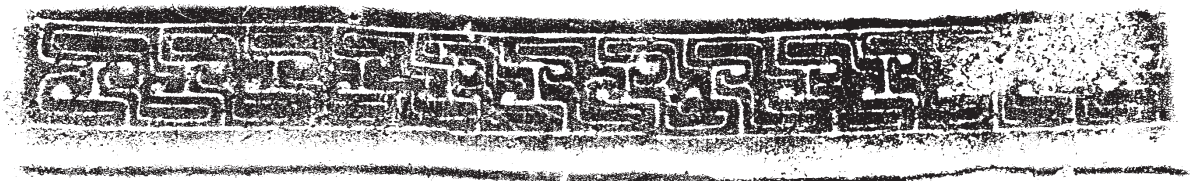
参照江北诸组的器物组合与年代,谢垅附耳平盖鼎的年代应不晚于春秋早期。

三 曲柄盃

曲柄盃的基本形态是上部为盆或钵,下部为鬲。腹设一流一簋,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簋为卷曲形,在一足之上。曲柄盃的形制、变化、年代、功能与命名,马今洪^[18]、张钟云^[19]、郑小炉^[20]、毛颖^[21]等都有很好的研究,名称也有甗形盃、鬲形盃和流甗的不同。

皖南共出土8件曲柄盃,地点集中在铜陵、繁昌、南陵和芜湖这一相互连接的区域。依上部形态的不同,可区分为2型。

A型上部为盆形。依曲柄的形态区分为2个亚



图四// 附耳平盖鼎腹部纹饰拓片



图五// 附耳平盖鼎盖外沿纹饰拓片

型。Aa型实心单曲柄。一般尾端龙首形,口下一周纹饰带。3件。铜陵县钟鸣乡出土1件,曲柄上扬,柄端龙首回顾,龙吻、龙角上卷。口下饰一周夔纹^[22]。繁昌县赤沙乡新塘出土1件,曲柄上扬,尾端残。口下饰一周卷云纹^[23]。南陵县家发乡长山出土1件,曲柄断残。口下饰一周夔纹^[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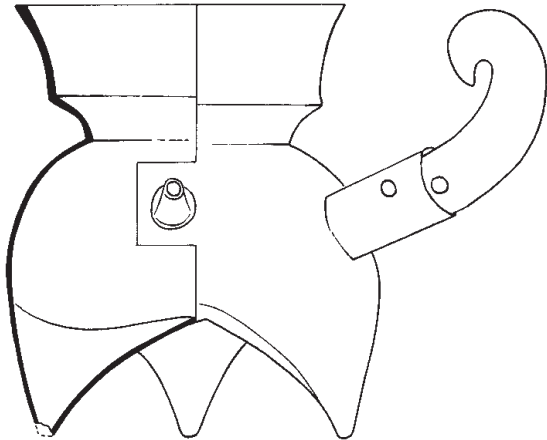
Ab型管状套接两段式曲柄。一般通体素面。3件。谢垅出土1件(铜陵a7),尾段曲柄卷曲,有销孔。通高19、口径14.4厘米(图六;彩插一:1)。芜湖市柳春园出土1件,尾段曲柄缺失^[25]。铜陵县西湖轮窑厂出土1件,尾段曲柄缺失,有销孔^[26]。柳春园组伴出牺首鼎,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

B型上部斡口钵形。管状短柄,或为两段套接式曲柄。通体饰纹。2件。铜陵市金口岭出土1件,管状短柄。口下饰一周勾连云纹,肩饰一周窃曲纹,袋足饰变形夔龙纹^[27]。铜陵市出土1件,上部残缺,管状短柄。肩饰一周窃曲纹,袋足饰云雷纹地变形夔龙纹^[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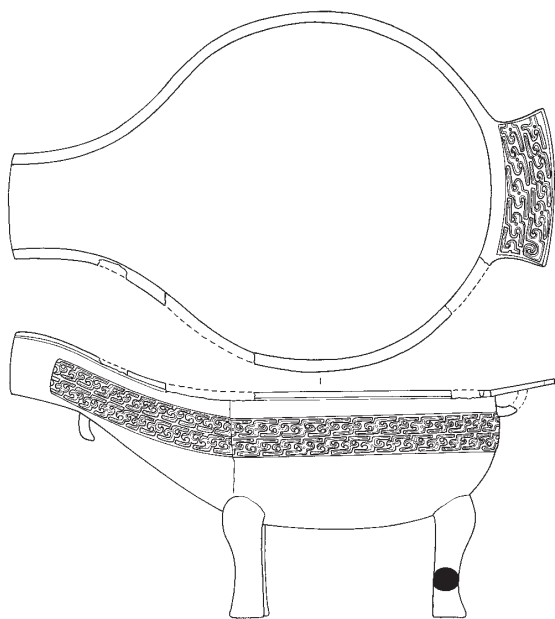
曲柄盃宁镇区没有发现,江北区则多有出土。Aa型江北区发现3件,器形与皖南所出完全一致,且均有成组器物伴出。舒城县春秋塘出土1件,伴出夔龙纹附耳平盖鼎^[29]。庐江县盔头出土1件,伴出撇耳浅垂腹鼎^[30]。以上2组的年代都不晚于春秋早期。潜山县黄岭出土1件,伴出折肩鬲、连体甗和提梁釜盃等,年代在春秋中期前后^[31]。

Ab型在江北区发现5件。六安市燕山村出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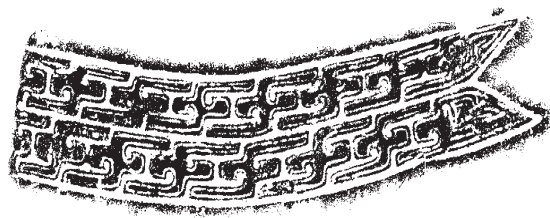
件,口下一周夔龙纹。该组还出土1件钮盖鬲形曲柄盃,形态就是甗形盃去掉上部的盆或钵,盖及肩部各饰一周夔纹^[32]。燕山村组伴出凤纹垂腹尊和附耳圈足盘。凤纹垂腹尊喇叭形口,垂腹,圈足。颈部饰一周凤鸟纹,在凤鸟纹之间有突起的兽首。圈足饰两道凸弦纹。此尊和破山口所出垂腹尊形制相近,破山口尊在上腹部有一道云纹带,并出两个兽首,圈足饰两道凸弦纹。破山口除出鱼龙纹附耳圈足盘外,还出土1件云雷纹附耳圈足盘。因此,燕山村组的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晚期甚至更早一些。舒城县河口出土1件,曲柄尾段卷曲,有销孔,孔内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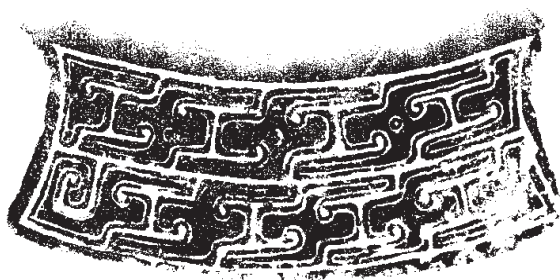
图六// 曲柄盃



图七// 三足匜



图八// 三足匜颈腹部纹饰拓片



图九// 三足匜底部纹饰拓片

有连接用的朽木,口下饰一周夔龙纹^[33]。河口组伴出夔龙纹附耳平盖鼎、小口罐形鼎、牺首鼎和圈足垂腹簋等,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怀宁县人形河出土1件,曲柄前段为六角棱形,有销孔,尾段卷曲^[34]。人形河组伴出牺首鼎、撇耳浅垂腹鼎、龙螭三足匜等,年代与河口组相近。庐江县岳庙出土1件,尾段缺失,有销孔^[35]。岳庙组伴出牺首鼎,年代与河口组相近。舒城县凤凰嘴出土1件,尾段缺失,有销孔^[36]。凤凰嘴组伴出附耳平盖鼎、牺首鼎、折肩鬲等,年代在春秋中期前后。

A型曲柄盃在湖北的汉川^[37]和湖南的衡阳^[38]还分别发现1件,伴出器物成分相对复杂,汉川所出扁体簋,饰细密而凸起的蟠虺纹,与丹阳司徒组、溧水宽广墩组所出较相似。

B型在江北区发现2件,形制有差异。肥西县小八里出土1件,浅钵斝口,曲柄尾段缺失,有销孔。口下饰一周拉伸式重环纹^[39]。小八里组伴出龙螭四曲蹄足匜、附耳圈足盘、小方簋等,年代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舒城县五里出土1件,上部斝口钵形,曲柄尾端向上卷曲,有销孔^[40]。五里组伴出牺首鼎等,年代在春秋早期或稍后。

B型在其它地区发现3件。上海博物馆藏品1件,形态和五里盃相接近,盆上有高盖,顶设捉手^[41]。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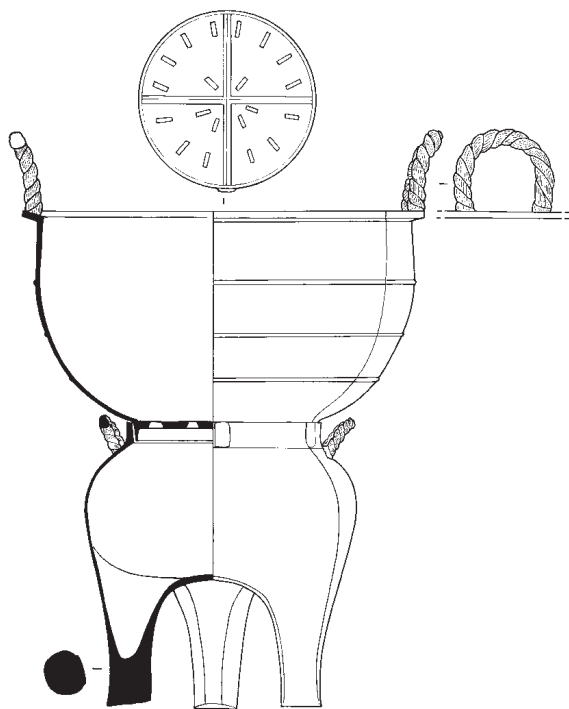
阳黄君孟夫妇墓出土黄夫人盃,平盖,盆口内敛,春秋早期器。该组同出1件鬲形盃,平盖,高裆柱状足,单曲柄上扬卷曲,尾端为兽首形^[42]。绍兴M306出土1件,甗鬲分体式,曲颈兽首流。口微内敛,平盖,中置提环钮,周置3个半环钮,盖饰交龙纹和双线S纹。口下饰夔纹及三角垂叶纹。鬲腹饰一周夔龙纹,上下以三角垂叶纹为界栏。管状把手较短,器把与器身可以旋合,把端饰三角雷纹^[43]。M306的年代在春秋晚至战国早期。

综上所述,Aa型和Ab型曲柄盃器形特征和伴出器物组合都比较接近,年代大体都在西周晚至春秋中期以前。B型形制差异较大,铜陵盃所饰窃曲纹和云纹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风格,小八里盃在西周晚至春秋早期,五里盃和上博盃在春秋早期或稍晚,黄夫人盃在春秋早期或稍晚,绍兴M306盃在春秋晚至战国早期。

因此,结合同组伴出器物,谢垅曲柄盃的年代应不晚于春秋早期。

四 三足匜

匜为盛水器,与盘配合使用。匜早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匜可能是从盃发展演变出的一种新器形,盃盘组合之后为匜盘组合。匜的形制,前有流,后有鋋,具三足或四足,春



图十// 分体甗

秋晚期以后有平底甗。

皖南共出土6件甗,都在沿江地区。除铜陵出土1件盘形甗^[44],其余5件甗的形制均为槽流,三蹄足,燕尾釜,流口下有齿状突。依腹部和槽流形态,又可区分为2式。

式深腹,短槽流。2件。繁昌县孙村镇窑上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窃曲纹,釜饰云雷纹^[45]。芜湖县韩墩村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窃曲纹,流口下间一卷云纹。釜饰云雷纹,外缘加一周鳞纹^[46]。孙村组伴出垂腹蹄足鼎、球腹蹄足鼎,韩墩组伴出球腹蹄足鼎,年代都不晚于西周晚期。

式腹稍浅,长槽流。3件。芜湖市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歧冠夔龙纹,右侧间一蟾蜍纹,釜饰雷纹^[47]。当涂县丹阳乡出土1件,口下饰一周云雷纹^[48]。谢垅出土1件(铜陵a12),口下饰一周夔纹,釜饰夔纹。通高22、口长径28.7、短径27.8、腹深10厘米(图七~九;彩插一:2)。

宁镇区出土2件 式甗。江宁县陶吴镇出土1件,伴出垂腹柱足鼎和立耳弦纹鬲,年代在西周中期^[49]。南京市板桥镇出土1件,伴出斜角云纹垂腹蹄足鼎,年代可能在西周晚期^[50]。

丹徒县磨盘墩出土 件三足甗,龙形釜。口下饰一周夔龙纹,流口下饰云纹,龙形釜饰垂鳞纹^[51]。磨盘墩组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江北区出土2件 式甗。淮河以北的宿州市平山村出土1件^[52],伴出球腹蹄足鼎、龙耳簋和折沿无耳鬲,年代在西周晚期。天长市出土1件,腹饰龙纹,釜饰云雷纹^[53]。

江北区其余所出均为龙形釜的三足或四足甗。四足的龙形釜甗在肥西县小八里^[54]和枞阳县金社^[55]出土,小八里甗为扁平足,金社甗为蹄足。三足的龙形釜甗在怀宁县人形河^[56]、庐江县三塘^[57]和寿县肖严湖^[58]出土,均为蹄足。

龙形釜与燕尾釜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龙形釜甗有三足或四足,受中原形制的影响更大一些,主要在江北区流行,皖南区迄今未发现此型甗。燕尾釜甗只有三足,主要在皖南宁镇区流行。通过以上资料的排比,参照同组伴出器物,皖南燕尾釜三足甗的年代可作以下安排: 式甗的年代在西周晚期, 式甗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谢垅甗属 式,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

五 分体甗

皖南出土4件分体甗,均在铜陵地区。其形制大体相同,仅附耳及纹饰略有区别。

谢垅出土分体甗(铜陵a11),甗绳辫立耳外撇,器身饰三周弦纹。鬲肩附绳耳外撇,弧裆柱足。通高42.7、口径29.8厘米(图十;彩插一:4)。

其余3件,铜陵县西湖轮窑厂出土1件,甗饰两道弦纹^[59]。铜陵市区扫把沟出土1件,甗饰一周变形夔纹,上下再各有一道弦纹作界栏。鬲肩附环耳^[60]。铜陵市杨家山出土1件,甗饰一周夔龙纹,上下再各饰一道凸弦纹^[61]。

尽管商代就有分体甗,如妇好分体甗,但分体甗主要从春秋以后开始流行。与铜陵一江之隔的无为县开城镇出土1件分体甗,甗立耳盘口式,深腹直壁,口下饰一周窃曲纹,上下再各饰二周弦纹。立耳外侧饰两道弦纹,耳顶部伏兽饰。鬲肩附绳辫形小环耳,弧裆柱足^[62]。盘口直壁式甗与繁昌汤家山牛角兽面纹连体甗相近,窃曲纹型式也可与汤家山组相比较。鬲则与谢垅分体甗形制相近。开成组同出垂腹蹄足鼎,窃曲纹球腹蹄足鼎和一种形制独特的鸟盖蛋形盂,年代应不晚于西周晚期。开成甗或可将西周连体甗与春秋分体甗连接起来。

因此,谢垅甗的年代,参考同组所出其它器

物,可早到春秋早期。铜陵所出其它3件分体甗的年代亦应大体与此相近或稍晚。

南方其它地区出土谢垅式分体甗的时代都较晚,如浙江绍兴M306^[63]、湖北曾侯乙墓^[64]和四川新都马家山^[65]等所出,已经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根据上述各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可以拟定谢垅组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

经与宁镇、江北及中原地区的比较,其形制特征可作如下的描述:球腹蹄足鼎和所饰重环纹都是中原的形制,谢垅和正兴球腹蹄足鼎所饰拉伸式重环纹在江北也有发现。附耳平盖鼎为江北器形或受江北器形的影响,其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要素对春秋中晚期及其以后鼎形器影响深远。皖南曲柄盃出土地点集中在铜陵、繁昌、南陵和芜湖沿江一线,江北区亦集中出现在六安、肥西、舒城、庐江、怀宁这一狭小区域,两者的族群渊源和年代关联显而易见。燕尾罍三足匜流行于皖南沿长江地带,江北有零星出土,而江北流行的龙形罍三足或四足匜则不见于皖南。皖南分体甗仅铜陵一地发现,江北无为开城出土西周晚期分体甗,可为解决皖南分体甗的年代提供线索。

由此可见,谢垅所出青铜器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本组青铜器或更多接受了江淮群舒文化的影响,亦可蠡测为江淮群舒族群的向南迁播。刘建国曾通过江南出土的青铜鬲、甗和小口罐式汤鼎等器的比较分析,得出宁镇及皖南沿江地区青铜器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江淮青铜文化风格的认识^[66]。张敏认为铜陵、南陵、芜湖、繁昌出土的曲柄甗形盃,可能为与江淮之间的徐、舒相互影响的产物。皖南与江淮地区的徐、舒之间的相互影响始于西周,春秋早期得到加强,甚至深入到皖南;春秋中期以后徐、舒的影响消失殆尽^[67]。这些观察与认识都是极富启发和洞察力的。

多数学者对通过土墩墓性质和年代的研究解决皖南青铜器的年代与归属保持乐观,但实证性的研究进展仍然有限,部分个案甚或陷入循环论证。与学界某些将皖南宁镇土著型器物归为春秋以后吴越体系的方法论倾向相近似,依目前的分期断代体系,与皖南区关系密切的江北区除可以辨明的宗周器以外,有着明显地域特征的以牺首鼎、附耳平盖鼎和曲柄盃等组成的器物群大都归

为春秋以后的群舒遗物。方法论的重新思考,正是构建皖南西周春秋青铜器年代体系的出路所在。

- [1]张国茂:《安徽铜陵谢垅春秋铜器窖藏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55、63、66、93、102,文物出版社2006年。
- [2]肖梦龙、林留根:《皖南吴国青铜器分期研究》,《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9年。
- [3]杜迺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青铜文化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9年。
- [4]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 [5][6][7][8][10][22][23][24][25][26][27]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88、89、28、29、97、53、50、51、49、54、52。
- [9][55]未见著录,枞阳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1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卷11图168,文物出版社1998年。
- [12]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53。
- [13][57]未见著录,庐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14]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169。
- [15]未见著录,望江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16][29]未见著录,舒城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17]殷涤非:《铉鼎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 [18]马今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年第5期。
- [19]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 [20]郑小炉:《试论青铜甗(鬲)形盃》,《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 [21]毛颖:《南方青铜盃研究》,《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 [28]未见著录,铜陵市文物管理所收藏。
- [30][39][54][64][65]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卷11图174、173、176、117、114。
- [31]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
- [32]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1993年第7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卷 11 图 175。

- [3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 年第 6 期。
- [34]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1 期。
- [35]马道阔:《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东南文化》1990 年第 1 期。
- [36]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 年第 10 期。
- [37]沈银华:《湖北省汉川县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文物》1974 年第 6 期。
- [38]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衡南、湘潭发现春秋墓葬》,《考古》1978 年第 5 期。
- [40]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第 6 辑,黄山书社 1990 年。
- [41]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 197 页图 521。
- [42]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7 图 89、90。
- [4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 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11 图 156。
- [44][45][46][47][48][59][60][61]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 2006 年,图 62、37、38、39、67、68、69。

- [49]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0 年第 6 期。
- [50]未见著录,南京市博物馆收藏。
- [51]南京博物院等:《江苏丹徒磨盘墩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 年第 11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11 图 61。
- [52]李国梁:《安徽宿县谢芦村出土周代青铜器》,《文物》1991 年第 11 期。
- [53]陈建国:《安徽天长县出土西周青铜匜》,《考古》1986 年第 6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11 图 161。
- [56]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1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11 图 178。
- [58]寿县博物馆:《寿县肖严湖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90 年第 11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卷 11 图 177。
- [62]未见著录,无为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 [6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三〇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 期。
- [66]刘建国:《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东南文化》1994 年第 3 期。
- [67]张敏:《读〈皖南商周青铜器〉有感》,《中国文物报》2007 年 4 月 11 日第 4 版。

The Date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Bronze Wares Unearthed at Xielong of Tongling

ZHANG Ai-b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he bronze wares excavated from Xielong caches in Anhui Tonglin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bronze research in Wannan (South Anhui) area because of the exact site, intact combination and new style. Based on analytic comparison of the combination, shape and decoration, these wares can be dated to early Spring & Autumn Period and be inferr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Shu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culture from the Jianghuai area to the south.

Key words: Xielong of Tongling; bronze wares; early Spring&Autumn Period; Shu Ethnic Groups

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



1.曲柄盃



2.三足匜



3.重环纹鼎



4.分体甗



5.附耳平盖鼎